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常卓超

郑观应(1841—192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早期改良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生于鸦片战争后一年,在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者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压力和节节进逼之下,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特别是1851年的太平军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封建统治根基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采取投降和勾结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经济上,自然经济的解体,近代工业的产生,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都使社会上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地尖锐化和复杂化起来。

针对这种局面,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及其政治集团,都通过自己的代表人物,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郑观应就是这一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的代言人。他的主要政治、经济活动是在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刚好也是洋务运动从开场所到彻底失败的时期。

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是极其愤恨的,特别是目睹了1860年的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攻陷了清朝的首都——北京,连皇帝也逃到热河去了,这一事件使他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渴望求得救国救民的办法,而当权的贪官污吏们的所作所为,使他感到历来知识分子所走的作官出仕的道路,并无助于实现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于是,他决定走另一条道路,

即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道路,以求得国家的富强。

他十七岁那年,因考试不第,遂放弃举业,到上海去参加了当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丝茶的经营。此后的四十多年,他先后当过洋行的买办,如曾任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的经理;在洋务派官僚们大举兴办新式企业时,他以商股身分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并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经营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局、电报局等;此外他还当过商办时期的粤汉铁路总经理,创办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在国内各重要口岸开过航运公司。

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几十年间,他先后撰写和辑录过许多议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多数在报纸上发表过。早期的文章曾于1862年辑成《救时揭要》一书,以后,陆续发表文章,1871年辑成《易言》一书,由王韬在香港出版,至1892年又增订改名《盛世危言》。

除了从事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动以外,形成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其它重要因素还有:他青年时曾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学会了英语,当过翻译,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说,读过更多的有关“西学”的书报,他还到国内各地和外国去考察时政和工商业状况,并与当时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熾等有交往,和他们交换过对时政的意见,因此,在思想上彼此都有过一些影响。

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就使他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同时期的其他改良派人物比较起来,具备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由于郑观应是商人出身，所以他比官僚、地主出身的改良派人物更少带封建性，他的主张也更直接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对当权派的批评也更为大胆和少所顾忌。

其次，由于他博览中外书报，游历过外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教育制度等有较多的了解，特别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经营过各种近代工商业的资本家，因而他的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的主张就提得比较具体和细致。

此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他虽然是害怕和敌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的，但是，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符合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中的官僚、地主的利益；同时，由于经营工商业的需要，他在社会上的交接相当广泛，这就使他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人。

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经过长期的萌芽阶段，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我国新式工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逐步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这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可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一开始走上社会历史舞台，就遇到了远比它的力量强大得多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竞争，和官僚买办势力从经济上政治上的压制，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

郑观应是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中心思想自然是要求发展民族资本，对于上述阻碍民族资本发展的两种势力，就不能不提出抗议，进行斗争。

他虽然做过洋行的买办，但他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初则习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甘心做洋奴，而专心谋求个人发财致富的人。他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和无恶不作的罪行，曾屡次提出强烈的抗议，对外国侵略者侵夺我内河航行、开矿、筑路等权利也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对清政府多方袒护和包庇外国犯罪分子的行为也屡加抨击。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方法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华人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偵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託修和，阴存覬覦。”^①

他揭露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通商和传教的阴险目的：“传教者，则非惟欲服中国之人心，兼为洋商之偵探也。”^②他强调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专以“传

教”和“商战亡人之国”。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郑观应不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有时对它们还抱有很多幻想。起初，他曾幻想美国侵略者会和中国友好，并援助中国对抗其他资本主义侵略国家：

“英人险诈，法人鷲猛，……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立教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则遥借声援。”^③

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又对帝俄、德、法等国抱过幻想：

“曩尝论我国宜仿远交近攻之法，结英拒俄，同心力以巩边疆。今于中日战后，始知英之不能为我援者。……我国当前鉅痛深之会，英美皆作壁上观，独俄人仗义执言，邀同德法，使日本还我辽东，复为我贷银作保，虽有私意，安知我不能借此自强？”^④

等到俄德法分别要求割地、租界、开口岸做为“三国还辽”的报酬时，他才恍悟到“其初心岂真大公无我，济弱扶倾也哉”。在经过外国侵略者几度侵华的历史教训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主持公道是不可能的。

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郑观应认为是必

① 《传教》。《盛世危言》二编，卷二，光緒二十四年图书集成局本。

② 《商务》。《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二编，卷一，光緒二十四年上海著易堂本。

③ 《边防》。《盛世危言》二编，卷二，以下引文各注均见图书集成局本。

④ 《边防》。《盛世危言》三编，卷三。

須認真對付的，但是，他對封建統治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之間的勾結，起初是沒有清楚的認識的，因而，屢次徒勞無益地向清政府提出了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呼呼和建議。

鄭觀應對官僚買辦集團以喪權辱國的代價達到的“中外和局”深感不滿，因為這種局面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得以進一步排擠中國的民族資本。他說：“方今門戶洞開，任洋商百計壟斷，一切機器，亦准其設廠舉辦，就地取材，以免厘稅，其成本較土貨更輕，誠喧賓奪主，以攘我小民之利。”一旦發生外國商人欺侮華商的事件，訴諸衙門，“華官不惟不能助商，反腴削之，遏抑之”。^① 他還指出外國商人的“輪船飛馳于港汊，馬車沖突于通衢，無事而帶持軍器，用人而刻扣工資，空盤倒賬，袒庇教民，包攬其捐，掠販人口，凡此種種妄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② 但这一切又為什麼行得通呢？因為：“我每曲法相就，華民之忍辱，由於畏官長，官長之曲法，由於畏朝廷。”下面，他沒說出朝廷之曲法是由於畏外國人的話。但後來他在一封信里說道：“外國動輒挾天子令諸侯制百姓，故有外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外人之謔也。”^③ 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包庇和勾結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勾當。

他指出清政府制定的稅則對於外國商人輕稅，對中國商人重稅的種種不合理，如“同一洋貨，在洋人手則無厘捐，在華人手則納厘捐”。他要求清政府收回海關，實行保護關稅政策，還要求政府嚴格限制外國人在華置產，並建議外國人以入中國籍為置產的條件，反對外國教堂在中國各地兼併土地。

他要求當道對外國侵略者的強橫和不合理要求，必須堅持民族立場，絕不可妥協。“縱百計恃強要挾，官可罷，頭可斷，鐵案終不可移，彼雖狡悍，其奈我何”。^④ 可是，官僚買辦集團自頂至踵的那一副奴顏媚骨怎麼可能表現出這樣的民族氣節？他批評當權派“雖日受外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為耻”。^⑤ 鄭觀應要求在政治上堅持民族立場這一點，是他和洋務派官僚買辦集團之間的重要分歧。

為了有效地防禦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他主張加強國防力量，這就要首先改變那一套腐敗落

後的兵制，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陸軍和海軍，駐守邊疆和沿海。其次，還要“講求武備”，用新式武器裝備軍隊，這一點在表面上看，似乎與洋務派沒有什麼分歧，因為洋務派也在談論“富國強兵”之道。在洋務派興辦的“新政”中，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軍事工業，自制船炮武器。但鄭觀應與洋務派的不同，在於他所主張的自制武器是建立在自制設備原料、自己培訓技術人才的民族工業基礎上的，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對付外國侵略者；而洋務派的“自制”武器是依靠洋人洋匠，從設備到技術都依靠外國人來解決的殖民地加工工業，其目的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

鄭觀應認為對付外國侵略者，固然要講求強兵之道，但最根本的辦法還在於使國家富強起來，他主張“練兵將，制船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按當為寓之誤——作者）無形之戰，以固其本”。^⑥ 以“商戰”為主，以“兵戰”為輔，兵戰又以防禦為主。

鄭觀應的反對侵略和愛國思想也貫串在他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的看法上，他對農民的革命運動雖然是害怕的和敵視的，但他始終認為外國資本主義的軍事侵略特別是經濟侵略才是最大的危險。

民族資本除了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排擠，還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壓制。鄭觀應對此也非常不滿。他說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無護商之良法”，中國工商業發展不起來的原因，“非但集股難，亦因所抽稅厘過重”。而所謂“集股難”，並不是民間沒有資本可集，實在是因“困商之虐政”阻礙了人們投資經營工商業的積極性。因此，他要求政府撤卡裁厘，減輕商民的捐稅負擔，並實行鼓勵集合資本、組織公司、授予專利權等有利於發展工商業的政策。

鄭觀應雖然反對統治階級對外國資本的縱容和對民族資本的壓制，但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力量的薄弱，就仍然不能不幻想依

① 《商務》上。《盛世危言》三編，卷一。

② 《交涉》。《盛世危言》初編，卷二。

③ 《致姚伯懷太守書》，后編，卷三。

④ 《交涉》。《盛世危言》初編，卷二。

⑤ 《上戴少懷尚書書》，后編，卷七，第二十八頁。

⑥ 《商戰》下。《盛世危言》三編，卷二。

靠当权者的保护来发展民族资本,他以商股身分担任“官督商办”企业的职务,也可以说明他对统治阶级抱过幻想。他起初曾表示赞成“官督商办”,并分析了单由官办或单由商办的缺点。“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①他的出发点是以商为主,以官为护符,企图借着“官督商办”的名义,避免官府的勒索,从而实现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但是,这与洋务派官僚们的想法可是大相逕庭的,洋务派官僚们是借“官督商办”之名,行壟断新式工商业之实,从而实现其扩大洋务官僚集团势力的目的。

这种“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之后,特别是在他亲自参加了招商局的管理工作之后,才使他认识到封建政权的种种腐败完全体现在企业里,并且使企业也变成了腐败的官僚衙门。对于商股,结果是“赢则借事勒捐,亏则多生枝节”。^②以招商、电报、开平三局为例,由于营业不好,入不敷出,经过他多年的惨淡经营之后,洋务派官僚见到企业能获厚利时,就“贖归国有”,吞併商股。后来,他说自己经营工商业三十多年,“颇知中西利弊之梗概”,算是看透了洋务派官僚们“官督商办”这块招牌的实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③以后洋务派曾委他帮办开平矿唐山局,他辞而未受,对“官督商办”已经毫无兴趣了。

在他脱离“洋务”工作之后,便积极主张无论铁路、輪船、紡織、制造等各种行业“一体准民間開設,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以官場体統”。^④

郑观应不但积极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在改良主义者中间最先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较为全面的经济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暢其流”。^⑤

为了实现这个纲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主张和措施。

他特别强调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他一反封建主义社会中贱视商业的观点,把“商”提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认为一

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达都必须以发展商业为前提。他说:

“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⑥

他还认为商业的发达与否,不仅关乎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的贫富:“盖懋迁有无之事,匪独一家之利鈍,并关一国之盈虛。”^⑦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多一半是来自商税,如果采取奖励工商的政策,进一步发展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而且可以解决国家财政上的困难。

他在强调商的重要性时,并不否认工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他认为工与商是“互相表里”的,商业固然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工业生产也是发展商业的基础。“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⑧一个国家无论自然资源如何丰富,若不发展工业生产,于国于民就毫无益处,而终必被资本主义列强掠夺而去。因此,他主张必须“以工翼商”。

综上所述,他虽然非常重视和强调工业生产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出发点和最终的依归仍然是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⑨因此,可以说,他的经济思想是具有相当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的。

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中的表面现象观察问题,这是由当时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中国重商主义观点的产生,也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严重竞争,使民族资本

① 《开矿》。《盛世危言》初编,卷五。

② 《船政》。《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③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④ 《商务》。《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⑤ 《盛世危言》自序,初编卷一。

⑥ 《商务》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⑦ 《邮政》上。《盛世危言》初编,卷四。

⑧ 《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⑨ 《商战》下。《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痛感“商战”的威胁所致。

关于农业，他虽然没有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去考察，但却说出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各具，鉅细毕赅。”^①他赞同林则徐和冯桂芬在西北种植水稻和广种桑田的主张，以发展蚕丝等商品性产品，并曾建议试种美棉，俟有成效，即集股设立种棉公司。从他主张发展农业

的商品性作物来看，主要是为了生产出口商品和为工业提供原料，而很少从“民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经营的“沽塘耕植畜牧公司”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企业，他虽未正面论述农业上的生产关系，但从他的经营实践上已完全可以说明他必然主张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毫无疑间的。

三

为了实现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郑观应还提出了在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主张。改变政治制度这件事，对于顽固守旧的封建统治阶级说来，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为了说服封建统治者接受变法的建议，他和其他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从《周易》上吸取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发展观念，并以之做为变法的理论武器。他说：“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②又说：“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之法。”变法的关键何在呢？他的答案是设议院和实行立宪制。他说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议院的好处是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③就是说，要求实行限制君权，让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制。

他又清楚地交代了在这一新制度下，国君的权利所在，“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餉，其权实操诸庶民”。只有如此，才能“君民相维，上下一德”。^④这里所说的“庶民”和“民”指的当然是资产阶级。他虽然也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呼吁，但在参加政权的问题上，他却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够资格。这可以用他提的议员条件来说明：“非入本籍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⑤显然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不可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君主立宪制的实质就是让资产阶级参加到封建统治阶级控制下的政权中来，并取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议会也还是一种咨询机构，并无立法权，这虽然是

极初步、极有限的民主思想，但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闷空气里，出现了这种和千古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要求，究竟是一件新鲜的值得重视的事情。

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他还具体提出要求，在中央设立商部（实即兼理商、工、矿、交通各业的经济部），在各省县分设商务局和商务所，“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同时，他还倡议组织商会，这说明资产阶级已经要求参与工商业的行政管理权，并成立保护本阶级利益的组织，以抵抗官府“病商”的种种苛政。

在早期的著作中，他也认为变法应该是“可变革者器，不可变革者道”，封建的纲常名教应该予以保持。这一方面说明早期改良派在思想上还受着较多的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力量的薄弱，要实行改革就不能不对封建统治者作较大的妥协，以取得他们的宽容和支持。但是，在民族资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它们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之后，郑观应也逐渐认识到，如果封建统治的“道”完全不变的话，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于是，他后来就逐渐超出了变“器”的范围，在不公开抛弃“不可变革者道”的口号的情况下，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些变“道”的要求。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极力反对八股取士，要求按照西方的办法，改革教育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

① 《农功》。《盛世危言》初编，卷三。

② 《公法》。《盛世危言》二编，卷一。

③ 《议院》。《盛世危言》初编，卷一。

④ 《公举》。《盛世危言》三编，卷二。

⑤ 《议院》。《盛世危言》初编，卷一。

經濟培育人才。他批評封建的舊教育制度是“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不但是學用不一致，而且嚴重地埋沒人才，他指出科舉制度不能發揮人們的才能和抱負，往往使才智之士“或湮沒不彰，或名山終老”，貽害之甚，一至於此。

他主張取士的標準應當是“論其藝而不論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資格”。他主張培養學用一致的人才，因此就非常強調專業教育。在專業的設置上，他建議分“天文、地理、農政、船政、算化、格致、醫學之類及各國輿圖、語言文字、政事律例”等各科，以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他不僅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還進一步要求改變社會風氣和人們的思想意識。他要求社會上“切勿薄視商工”，而是要給商業、工業資本家以較高的社會地位，“予以體面”。他批評封建士大夫階級不苟言名利，而又實際上追逐名利的

的偽善態度。他提出“人之所重，名利二端”，公開宣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世界觀。在他看來，人們追逐名利是正當的，無可厚非的，問題是必須在社會道德觀念上予以承認。他要求樹立“做商得財，人皆仰之；做官得財，人皆鄙之”^①的資產階級道德觀念。

在他探究國家富強之策的過程中，終於發現并得出了“中國與外國之貧富強弱，由於禮教不同，中國以家族主義，外國以國家主義”^②的結論。在這裡，他所說的“家族主義”實即指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封建主義自然經濟結構，“國家主義”實即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國民經濟，“禮教”不同，實即指社會制度不同。這種認識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水平，較為明確地表達了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主義制度的要求。

四

鄭觀應反對外國的經濟侵略和愛國思想是突出的，也是一貫的。他的發展民族工商業的各種主張和要求很能切中并完全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的思想、著作在當時社會上發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他不僅繼承了前人進步的和有益的經濟思想，而且有所發展，對於後來改良主義運動高潮的到來，也起了思想上的先導作用。

他為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提出的變法主張，表現了他思想的進步面；同時，他又主張保留綱常名教，不觸動、至少在表面上不觸動封建統治的根基，希圖依靠封建統治階級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又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

的軟弱性。

由於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所形成的在力量對比方面的懸殊狀況，使他的改良主義經濟和政治方案，也和其他改良派人物的主張一樣，是注定了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他的思想和主張，對民族資本的發展，對爭取民主和社會進步的鬥爭，以及對反侵略和愛國思想的傳播方面，都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因而他在中国近代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應當加以肯定的。

① 《捐納》。《盛世危言》三編，卷二。

② 《致潘征君書》。《盛世危言》後編，卷四。